

索尔仁尼琴：俄罗斯作家的历史际遇与知识分子式的历史思考

张建华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索尔仁尼琴是苏联时期著名的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表，在他的身上更多地体现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品德与个性。他以其曲折艰辛的历史际遇以及深邃致远的历史思考，在 20 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索尔仁尼琴；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新斯拉夫主义

Aleksandr Solzhenitsyn: his historical experience as a russian writer and
historical thinking as an intellectual

Zhang Jianhua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100875

Abstract: Solzhenitsyn is a famous writer and dissident of Soviet Union, who reflects the morality and character of russian intellectuals. He had a difficult experience and profound thinking and plays an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intellectuals of 20th century.

Key words: Aleksandr Solzhenitsyn, dissident, Russia, new Slavophilism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1674-2338(2010)06-0000-00

在 20 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索尔仁尼琴（А.И.Солженицын）以其宏篇巨著及其国际影响毫无疑问地占据特殊的地位，乃至生前就被世人称颂为“当代的列夫·托尔斯泰”（Л.Толстой）。然而，或许是因为人们过于关注索尔仁尼琴的“伟大作家”的身份和“伟大作品”的影响，而忽略他的思想家身份。当索尔仁尼琴以 90 高寿于 2008 年 8 月 3 日离世之后，他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身份才彰显于世。这位自称“生活在 20 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经历了苏联和新俄罗斯两个时代，他以其曲折艰辛的历史际遇以及深邃致远的历史思考，在 20 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 创作历程与政治际遇

索尔仁尼琴于 1918 年 12 月 11 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他的父亲在其出生前就战

死于德国战场，他的母亲是富有的乌克兰库班农民之女，接受过那个时代良好的教育，熟练掌握英语和法语，她以做速记员的微薄薪水维持了家庭简单生活并抚养子女长大。1924年，索尔仁尼琴一家迁居到顿河畔罗斯托夫市，中学毕业后，他考入顿河畔罗斯托夫大学的数学物理系，1941年以

收稿日期：2009-12-20

基金项目：教育部2010-2013年度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苏联早期文化革命与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10YJA770068）。

作者简介：张建华（1962-），黑龙江省哈尔滨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世界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俄国（含苏联时期）思想文化史、中俄关系和俄国汉学史。

优异成绩毕业。他同时作为莫斯科哲学、文学和历史学院的函授生^①，坚持着自己的文学爱好。卫国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炮兵部队，因作战有功，获得卫国战争二级红星勋章，后军衔升至大尉。

1945年2月厄运袭来，索尔仁尼琴因在书信中写了批评苏联领导人的话，被苏军侦察机构逮捕，关进著名的卢比扬卡监狱，罪名是“从事反苏宣传和组织反苏组织”，后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1款被判处8年监禁，先后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多个集中营中服刑，这些终生难忘的经历成了索尔仁尼琴系列集中营作品的素材。1953年2月13日，索尔仁尼琴重新获得自由，但他被告知不允许回到莫斯科或列宁格勒，不得不在远离大都市的偏远城市——梁赞的一所中学里担任数学课教师工作。

赫鲁晓夫执政后苏联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解冻”让远离政治和文化中心的索尔仁尼琴看到了生活和创作的希望。1959年，他用三个星期创作了《854号牢房》（Щ-854）^②。随后他鼓足勇气，将作品委托狱友、文学家卡帕列夫（Л. З. Копелев）转交给当时代表思想解放的《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杂志。杂志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А.Т.Твардовский）欣赏这部作品，他鼓励索尔仁尼琴认真修改，并建议将书名更改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减少敏感性以便于出版。特瓦尔多夫斯基将作品送给赫鲁晓夫阅读，两周之后，《新世界》编辑部接到苏共中央的指示，要他们务必在次日上午交给中央23份《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决定正式出版这部小说。1962年第11期《新世界》杂志发表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同期配发特瓦尔多夫斯基撰写的前言，他指出“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1]1962年12月30日，索尔仁尼琴被苏联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刊登这部作品的《新世界》杂志在两天之内被抢购一空，后来杂志出

① 俄文为 Москов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философ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тории имени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1931年在莫斯科大学哲学和历史学系基础上开设，教师计有教授29人，副教授53人，助教25人。其中著名学者如阿巴托夫（М. В. Алпатов）、巴济列维奇（К. В. Базилевич）、巴赫鲁申（С. В. Бахрушин）、加尔金（И. С. Галкин）、波克罗夫斯基（М. М. Покровски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П. Ф.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等。该校校长是莫斯科大学哲学和历史系原系主任马

诺索夫(С.И.Маносов), 1941年该校合并莫斯科大学。1931-1937年在列宁格勒也开设了一所同名高校(ЛИФЛИ)。这两所高校培养了32名研究生和230位大学生。其中有一大批著名的苏联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如著名诗人马奥洛夫(Николай Майоров)、卡冈(Павел Коган)、库里奇茨基(Михаил Кульчицкий)、奥特拉达(Николай Отрада)、纳罗夫恰托夫(Сергей Наровчатов)、乌里金(Павел Улитин),历史学家兼作家涅米罗夫斯基(А.И.Немировский)、哲学家和文化学家波緬拉茨(Г.С.Померанц),文学家巴赫姆茨基(В.Я.Бахмутский)、加里别林(В.А.Гальперин)、帕别尔内(З.С.Паперный)、阿诺索娃(Н.А.Аносова),外交家谢苗诺夫(В.С.Семенов)。

②又名《一个囚犯的一天》(Один день одного зэка)。

了两版单行本,发行达80万册。1963年3月10日的《真理报》报道,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索尔仁尼琴,他热情赞扬了这部作品,称这是“一部从党的立场真实地阐明那些年代苏联实际情况的作品”,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和需要的书”。[2]1964年,索尔仁尼琴获得了列宁奖章的提名。

索尔仁尼琴在他的自传体小说《牛犊顶橡树》(Бодался теленок с дубом)中记录:“直到1966年,赫鲁晓夫还给我寄贺年卡。这让我好不惊讶,因为此时我处于被捕的边缘。也许他不知此事。”[3]但索尔仁尼琴完全不买贵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账。他私下对朋友说:“我是被赫鲁晓夫捧起来的,在他面前,我没有行动的真正自由,我应当在对他和列别杰夫的态度方面永远毕恭毕敬感恩戴德,尽管这对于一个从前的劳改营分子来说是可笑的,怀着一种人对人的感激心情,这种感情是任何政治上的公正所不能取代的。现在,我摆脱了庇护,也就随之摆脱了对他们的感恩戴德。”

[1]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苏联政府的指责。这一年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他的作品被勒令从图书馆中撤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索尔仁尼琴被苏联作家协会接受,就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一句话的作用,而此时被开除也几乎是新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一句话而致。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苏尔科夫(Н.Д.Сулков)这样对比地评价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对于我们来说,索尔仁尼琴的创作比帕斯捷尔纳克更加可怕:帕斯捷尔纳克是个脱离生活的人,而索尔仁尼琴的气质具有动态性、战斗性、思想性,这是一个有思想的人。”[4](P. 89-90.)

1968年,索尔仁尼琴创作的长篇小说《癌病房》(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和《第一圈》(В круге первом)在西方出版,招致苏联政府的强烈批判。时任苏共中央委员、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肖洛霍夫(М.А.Шолохов)攻击索尔仁尼琴,“这是个疯子,不是作家,是个反苏的诽谤者”,索尔仁尼琴是“吃着苏联面包,为西方资产阶级主子服务,并且通过秘密的途径把作品送到西方的人”,是“苏联作家们要求除掉的典型疫病”。[4](P. 76.)

1970年,瑞典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决定将当年的文学奖颁给索尔仁尼琴,颁奖辞表彰“他在维护汲取于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道德力量”的巨大贡献。苏联政府认为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此举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1975年12月,流亡国外的索尔仁尼琴才得以前往瑞典领取奖金。1973年9月,索尔仁尼琴发出《致苏联领导人的信》(Письме вождем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正是这封信决定了他被驱逐而背井离乡的命运。

整个 60 年代（1964 - 1970），索尔仁尼琴专注于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的创作，1974 年《古拉格群岛》第 1 卷在西方出版了英文版，作品在西方和苏联之间引发轩然大波。1974 年 2 月 12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国籍，2 月 13 日把他驱逐出境。同年 10 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他先到西德，后移居瑞士苏黎世。1974 年，在索尔仁尼琴的倡议下，成立了“俄国帮助被通缉者及其家庭社会基金会”（Русский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Фонд помощи преследуемым и их семьям）。1974 年，他主持编写了苏联境外持不同政见者合作的文集《巨石之下》（Из-под глыб）。

1976 年索尔仁尼琴迁居美国。1969—1988 年，他完成了 8 卷本的宏篇巨著《红轮》（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该书第 1 卷《1914 年 8 月》和第 2 卷《1916 年 10 月》于 1971 和 1984 年由巴黎 YMCA 出版社出版俄文版，第 3 卷《1917 年 3 月》1986 年在巴黎由 YMCA 出版社出版。

在戈尔巴乔夫的全面改革和新思维的背景之下，“回归文学热”遍及全苏，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大量回归苏联。1989 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于 1969 年 11 月 5 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决议，认为它是“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1990 年 8 月 16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撤销当年的决定，恢复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国籍。1990 年《共青团真理报》（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和《文学报》（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第一次发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我们怎样安排俄罗斯：力所能及的思考》（Как нам обустроить Россию, Посильные соображения）。同年，苏联政府决定给索尔仁尼琴颁发列宁奖章，但被索尔仁尼琴拒绝，理由是：“我不能因为一本用几百万人的血写成的书而获得个人荣誉。” [4] (P. 120.)

1994 年 5 月 27 日，索尔仁尼琴在结束 20 年的流亡生活后，回归祖国。他选择的回国路线是经由阿拉斯加飞到西伯利亚，到当年曾关押他的劳改营管理总局所在地马加丹。他在演讲中表示：“我到这里向这块土地哀思，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当年在这儿被杀害，并埋葬在这里。在今天俄罗斯迅速政治变革的时代，人们太容易遗忘过去的几百万受害者。”索尔仁尼琴在演讲中主张：“离开精神净化，不会有真正的民族和睦。” [4] (P. 152.)

在返回莫斯科不久，索尔仁尼琴就于 1994 年 11 月在国家杜马发表人们期待已久的演讲。他批评了当政的叶利钦总统及其政府，“俄罗斯今天在各方面都处于深重的大灾难中，哀怨之声遍布四野。政府未能履行对公民的责任，国家走向一条虚妄、艰难和曲折的道路……谁都没有想到，摆脱共产主义的出路竟充满如此之多的痛苦……”这番话被与他曾经同属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阵营，但政治观点和政治理想南辕北辙的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Рой Медведев）称为索尔仁尼琴唯一一次“掷地有声的致词”。 [4] (P. 164.)

1998 年，在索尔仁尼琴 80 岁生日之际，他谢绝了叶利钦总统颁发的圣安德烈勋章，并称他“不能从一个将俄国带入当今灾难的最高权威那里接受奖赏”。 [5] 在普京（В.В.Путин）总统执政之后，索尔仁尼琴与政府的关系有所缓和。索尔仁尼琴一改他过去在苏联时代乃至在叶利钦时代对执政者的批判态度，对普京执政给予了高度评价。2007 年 6 月 12 日，普京高调地为他祝寿，并亲自去索

尔仁尼琴的寓所为他授予俄罗斯人文科学最高级别的国家奖章。普京总统强调要恢复俄罗斯人的道德基础、荣耀以及国际尊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普京试图恢复俄罗斯文化在俄罗斯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将大众媒体置于政治上附和的地位。普京把索尔仁尼琴和利哈乔夫（Д.С.Лихачев）视为俄罗斯思想大师，奉为坚持俄罗斯理想的楷模。普京称索尔仁尼琴是“为人民、祖国以及自由、正义和人道主义理想真心奉献和无私服务的榜样”。[1] 从 2006 年起，俄罗斯开始整理出版索尔仁尼琴全集，在 30 卷文集出版之际，索尔仁尼琴表示：“文学首先应该对人类负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家是不自由的。作家的自由体现在对创作的探索当中，他时时刻刻都承担着责任。这样的文学在俄罗斯曾经长期存在，将来依旧会存在。”[1]

索尔仁尼琴于 2008 年 8 月 3 日在莫斯科去世，享年 90 岁，3 天后在莫斯科顿斯科修道院以东正教仪式厚葬。随后在俄罗斯科学院礼堂举行了大型的纪念仪式，到会者有原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科学院院长奥西波夫（Ю. С. Осипов）、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夫尼奇（В. А. Садовничий）、前总理普里马科夫（Е. М. Примаков）等人。当天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了《关于建立索尔仁尼琴永久纪念碑的法令》（Об увековечении памяти А.И. Солженицына）。他致信索尔仁尼琴的遗孀索尔仁尼琴娜（Наталья Солженицына）^③，称“索尔仁尼琴的道路是一个真正战士的路，经受了一切形式的磨砺和艰辛”，他“对祖国和同胞充满了无限的爱”。后来，普京亦向索尔仁尼琴娜发电报，称：“自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去世忽已一年，在此期间，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祖国的文学和文化在全俄罗斯遭受了巨大的和无法弥补的损失。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是拥有多方面才华、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和坚定灵魂的人，是真正的俄国知识分子，是地球上真正的人，他丰富的创作和思想遗产将永远在俄罗斯文学和我国编年史中他占据特殊地位。”[6] 俄罗斯教育部宣布设立索尔仁尼琴助学金以资助大学生，莫斯科市政府宣布将用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命名莫斯科的一条街道。为举办索尔仁尼琴去世周年纪念活动，普京总理于 2009 年 7 月 28 日接见来访的索尔仁尼琴娜，表示：“再过几天，我们将迎来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去世一周年。今天我愿意重温一下我们当时和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讨论过的话题——对他作品的‘宣传’（пропаганд）或是‘研究’（изучение）……”索尔仁尼琴娜立即打断了普京的讲话：“研究更好些，比宣传好。”于是，在俄联邦政府网站（www. government. ru）的记录稿《普京会见索尔仁尼琴娜》中，写明“研究索尔仁尼琴的文学遗产。”[6]

二 “新斯拉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

索尔仁尼琴的价值观的核心是传统主义和保守主义，他经常自称自己是生活在 20 世纪的“19 世纪俄国人”。1970 年瑞典文学院颁奖词中也特别强调“他在维护汲取于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道德力量”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索尔仁尼琴的文学创作和政治理想的意义，就在于其对俄国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的继承，在于其始终坚持的“道德力量”和“俄罗斯思想”。从索尔仁尼琴创作的小说、政论著作中可以发现，他的世界观同样是保守主义的，他不仅继承了俄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批判传统，继承了 19 世纪俄罗斯思想的集大成者——斯拉夫主义思想传统，而且继承了 17 世纪的俄国分裂教派（сектанты 或 раскольник）情结。

③索尔仁尼琴娜出生于 1937 年，1972 年成为索尔仁尼琴的第二位妻子，她一直担任他的私人秘书，主管索尔仁尼琴手稿的收藏、编辑和出版，并管理索尔仁尼琴基金会。

分裂教运动（раскольничество）始发于 17 世纪中期，它是因东正教会大牧首尼康（Никон）强制推行宗教改革而引发的社会反抗和思想反抗运动。尼康控制的教会和沙皇政府对分裂派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分裂运动对俄国社会发展影响巨大而且持久，培育了社会面广泛的反教会和反政府的意识，而分裂派思想对俄国知识阶层的影响更为重大。索尔仁尼琴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遭受政治压制之后，就开始以长髯、粗衣、忧郁、寡言的形象面世，而这正是 18-19 世纪的分裂教派的典型形象。

索尔仁尼琴在 1973 年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提出要靠“还没有被尼康歪曲的、没有被彼得大帝搞成枯燥无味的俄国正教”来建立俄国人的精神家园，主张以“纯净的”西伯利亚为俄国发展之基地。他在《古拉格群岛》第 2 卷中重点描述位于苏联北部的索洛维茨修道院，并配上许多历史照片做了浓墨重彩的描述。历史上索洛维茨修道院正是分裂教派的“圣地”和“北方崇拜”的象征和众多分裂教派的殉难地。

在苏联时代，索尔仁尼琴所代表的持不同政见者派别群体人数甚少，但以极其鲜明的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独树一帜，20 世纪 70 年代索尔仁尼琴曾与代表持不同政见者的“西方派”的萨哈罗夫（А.Д.Сахаров）发生了激烈争论，焦点在于如何看待俄罗斯文化传统和如何看待西方文化。萨哈罗夫评价索尔仁尼琴 1973 年的《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充满了“反民主的、民族主义和‘危险有害’的内容”。“我必须表示我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不同意索尔仁尼琴的立场。但从另一方面讲，索尔仁尼琴信的公布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是一个按照原则自由讨论的事实。尽管索尔仁尼琴的一些观点和世界观在我看来是错误的，但仍然是现代悲剧世界中为争取人类价值斗争的巨人。”[4] (P. 89.)

索尔仁尼琴在 2001 年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二百年在一起》（Двести лет вместе）中也展现了他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书中描写俄国人和犹太人共处的历史，内容明显包含反犹太主义的内容。因此，犹太族学者马克·杰奇（Марк Дейч）、伊哈南·彼得罗夫斯基—施杰尔（Йоханан Петровский-Штерн）都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意见。弗拉基米尔·沃依诺维奇（Владимир Войнович）评价：“索尔仁尼琴的书《二百年在一起》又臭又长，而且谎言满篇。”[7]

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的最大邻居中国始终持不信任态度，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1994 年刚刚回归祖国的索尔仁尼琴在多次演讲都表达过这样的思想：俄罗斯政府忽略了远东，而听任中国人去占领，如不采取措施，远东乃至整个东西伯利亚都应充满黄种人。

索尔仁尼琴继承了 19 世纪斯拉夫派的思想，对西方文明始终采取强烈抵制和批评的态度。他认为：“历史悲剧在于，正是俄罗斯人本身消灭了自己的过去，也就消灭了自己的未来。”[1] 他在 1973 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提出，“西方世界和全部西方文明”正在走向“总崩溃”，但它并非由于苏联的成功，而是由于其自身的危机所致。其一是追求“无止境的经济进步”导致灾难，他因

此主张“经济增长不仅不必要，而且有害”。其二是城市化，他认为当时苏联城市人口比例占到一半，这已经是“反自然”“反人性”的，尤其是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更是祸害。其三是意识形态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当局强调苏联是马克思主义堡垒的说法相反，他认为这种“反宗教的无神论”在西方信者众多，在俄国其实没人相信，只是当局在把这种“西方的邪恶”强加于俄国人民。索尔仁尼琴认为如果不改弦更张，苏联将会因为“追随西方文明”而崩溃。

索尔仁尼琴的思想与俄国历史上的斯拉夫派是一脉相承的。不论是在苏联国内生活时期，还是在侨居美国时期，还是在重返俄罗斯之后的晚年时光里，他始终强调珍惜俄罗斯文化传统，始终没有放弃对俄国独特发展道路的坚持，以及对俄罗斯民族的“精神优越”的鼓吹，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对传统斯拉夫主义的核心进行阐释和发展，索尔仁尼琴无疑需要一种比霍米亚科夫（А.С.Хомяков）、达尼列夫斯基（Н.Я.Данилевский）、陀斯妥耶夫斯基（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索洛维约夫（С.М.Соловьев）等“老斯拉夫主义者”具有更多的勇气和自信。

索尔仁尼琴甚至对于在其人生最困难时期收留他的美国社会政治制度同样持不妥协态度。1976年，索尔仁尼琴刚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就在美国工会发表了演讲。他激烈指责美国资本家“为了赚钱可以完全丧失良心”，他们为了与极权统治者做买卖而不顾道义，与苏联领导人共同制造了慕尼黑式的“缓和”骗局，苏联政府残酷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使用的高端技术手段都是美国资本家提供的。索尔仁尼琴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大多数欧美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苏联合作打败了德意日极权国家，其本质是与虎谋皮，不过是“联合一个魔鬼打败另一个魔鬼”罢了。这一切都归结于美国资本家和美国政府没有原则、轻诺寡言，索尔仁尼琴因此号召美国“工人阶级”起来抵制“利欲熏心的资本家”把美国引入歧途。索尔仁尼琴应邀在哈佛大学发表讲演《分裂的世界》（Сепаратистский мир），对西方的拜金主义、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进行了抨击。他说：“真相多数是让人不愉快的，几乎总是逆耳的，而我今天的演讲也将是逆耳的。”他拒绝了西方的信仰，他并不认为西方民主适合于其他国家，他警告道，西方国家将其他国家的失败归咎于没有实行民主制度，这是一个错误。他称美国陷入了庸俗的物质消费主义泥潭。他谴责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在越南问题上“草率”投降，还痛骂美国音乐实在难听。他的演讲立即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美国媒体称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头”。美国总统福特（Gerald Rudolph Ford）准备接见索尔仁尼琴，熟悉国际政治和苏联政治的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劝告福特总统停止这个危险的举动，因为“索尔仁尼琴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他的政治观点对其他追随他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一个打击。……接见他不仅会冒犯苏联，而且还助长一些人的气焰，他们赞同索尔仁尼琴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观点”。[8]（P.2）福特总统因此取消了与索尔仁尼琴的会面计划。

在1999年出版的《坍塌的俄罗斯》（Россия в обвале）中，索尔仁尼琴表达了自己对强势的西方文化的进攻与俄罗斯文化软弱无力的回应的担忧，“俄国正在知识精英和西方，尤其是美国面前下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是向俄国施压的西方阴谋”，“俄国社会将毁灭；再过一个世纪，字典里俄国这个字眼就可能惨遭删除……”[8]（P.12, 15, 69）

2006年4月，索尔仁尼琴接受了《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的采访，他表示对北

约大规模东扩以及中亚和乌克兰等国发生的颜色革命的极度担忧，他认为：“北约组织有步骤和持续性地发展着自己的军事机构，在欧洲东部和在从南部包围俄罗斯大陆。颜色革命得到公开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北大西洋组织在中亚的利益得到离奇的推进，所有这些已经毫无疑问地说明了，正在形成对俄罗斯的全面包围，而不是失去自己的主权。”[9]

索尔仁尼琴保守的斯拉夫主义思想和极端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受到了萨哈罗夫等人的批评，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美国著名的俄国史专家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在 2008 年 8 月 7 日索尔仁尼琴去世后，在接受英文版《莫斯科新闻》（The Moscow Times）的采访时评价了索尔仁尼琴的政治和历史观点，“索尔仁尼琴赋予了苏联共产主义灾难在西方的责任。他确信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欧洲之根源，但是他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出问题，即：为什么在其他的欧洲国家没有走向古拉格，而是走向社会国家。他带着愤怒推测，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在于俄国的过去。他的俄国历史知识是肤浅的和充满浪漫主义的伤感。在指责西方是帝国主义之后，他好像一点都不知道他的祖国对于居住非俄罗斯人的区域的不可思议的扩张历史，”甚至他否定了沙皇俄国存在书报检查制度和判处持不同政见者服苦役，当然，荒唐之极。”这位最有学术资格对俄国历史和现实发表意见的美国历史学家的最后的评语是：“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保守传统中的一员，一个现代版的陀斯妥耶夫斯基。”[10]

三 我们怎样安排俄罗斯？

在经历了苏联时代的政治风雨、旅欧美时期的政治思考和新俄罗斯的艰难转型之痛后，索尔仁尼琴在晚年基本停止了文学创作，而专注于政治思考和写作。索尔仁尼琴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降的俄罗斯正处于历史上第三个困难时期，第一个时期是 17 世纪波兰和土耳其势力干涉俄罗斯和罗曼诺夫王朝的兴起，第二个时期是从 1917 年的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

《我们怎样安排俄罗斯：力所能及的考虑》（1990）、《20 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Русский вопрос" к концу XX в, 1994）和《坍塌的俄罗斯》（1999）是他的“政论三部曲”。在三部著作中，索尔仁尼琴已经不再仅仅从自己生活阴影中寻找写作素材，也不满足于通过文学作品体现其思想观点的间接手法，而是干脆直抒胸臆，对俄国历史和现状提出批评，对当权的权贵（包括叶利钦和其他俄罗斯政治家）进行无情批判，他开出的“济世良方”即是回到俄罗斯文化传统中去，回到东正教传统中，彻底摆脱已经毫无希望的西方文化和政治模式的诱惑，走俄罗斯自己的道路，较为集中地表达了他的“新斯拉夫主义”思想。

2007 年是 1917 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90 周年纪念日，当年 2 月索尔仁尼琴为宏篇巨著《红轮》第 3 卷写的纲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录》发表。索尔仁尼琴在文章中认为 1917 年的二场大革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都是应该咒诅的“西化式”的革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同样激进，前者直接导致了后者的结果。他再次主张珍视俄国的文化传统，反对激进式的革命和暴力。他同时激烈地批评了 90 年代初以来，叶利钦政府的激进改革和大西洋主义，这篇文章得到了普京总统的高度评价，他甚至把该文作为文件发给政府官员们学习。

索尔仁尼琴的三部政论著作中有三个贯穿始终的思想，其一是对人民的“自我管理”方式的倡

导;其二是对俄罗斯民族特性的强调;其三是对西方文化的不妥协式的批判。他认为在俄国历史上人民的自我管理已经成为一种极其有效的文化传统,应该加以继承。他甚至重提老斯拉夫派的学术观点,强调被人们误解数百年的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不应该理解为“绝对专制制度”(абсолютизм/Absolutism),而是人民“自我”(сам)加“管理”(держать)的特殊方式。俄国的力量、精华和希望,全都积淀在俄国的深处和底部,只有从最基本的民族利益出发,体现最普通人民的愿望,俄国的复兴才有希望,俄国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和发展道路也才能得以彰显。索尔仁尼琴认为历史上的西方世界对俄国一直怀有敌意,而不愿意看到俄国的强大,总是千方百计地破坏它的威信并置它于危险境地。当今的西方世界仍然给俄罗斯民族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即是明证,而苏联解体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待俄罗斯的所作所为更是说明了这一点。索尔仁尼琴认为从长远来看,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本身已经完全衰败和堕落,总是俄罗斯历史发展“路标”不明之时发出诱惑,让俄国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取向不时地左右摇摆,从而极大地影响到了俄罗斯人民自信心的树立以及俄国自主发展道路的开辟。

当年与索尔仁尼琴有着极其特殊关系的原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孙女、美国纽约新学院大学教授尼娜·赫鲁晓娃(Нина Хрущева)在2008年索尔仁尼琴去世后评价:“索尔仁尼琴的悲剧在于,尽管他在把俄国从独裁统治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俄国民众获得解放以后,除了责难他们,他就江郎才尽了。但是也许有一天我们俄国人民将会从我们虚假的梦想中解脱出来。那一天到来的时候,英勇的索尔仁尼琴,那个永不投降、永不遭到腐化的索尔仁尼琴将会恢复给我们。但是我们现在最为需要这个索尔仁尼琴,用弥尔顿失乐园描写地狱的诗句来说就是:索尔仁尼琴‘这并非光明,而是即将看得见的黑暗’(Солженицын – это не свет, а, скорее, видимая тьма)。”[3]在大多数人看来,赫鲁晓娃对索尔仁尼琴的评说显然是一种另类观点。

参考文献:

[1]《传记索引: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указатель: 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见:<http://www.hrono.info/biograf/soljenic.html>,最后登录时间2010年11月6日,发布时间不详。

[2]《真理报》(Правда)[J].1963-03-10.

[3]赫鲁晓娃:《预言家和政委》(Нина Хрущёва, Пророк и комиссары)见:<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khrushcheva35/Russian>,最后登录时间2010年11月6日,发布时间不详。

[4]萨拉斯基娜:《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Сараскина Л. И.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2008.

[5]叶卡捷琳娜:《索尔仁尼琴拒绝奖章》//《生意人日报》(Екатерина Д. Солженицын не принял награды. //Коммерсант\daily)[J],莫斯科:1998年12月15日,总第233期。

[6] 《普京会见索尔仁尼琴娜》(Путин обсудил с Натальей Солженицыной) 见：
<http://www.government.ru/content/governmentactivity/presscenter/soob%5Fpress/archive/2009/08/03/9835322.htm>, 最后登录时间 2010 年 11 月 6 日, 发布时间 2009 年 8 月 3 日。

[7] 弗拉基米尔·沃依诺维奇:《索尔仁尼琴:一个笨伯》//《俄罗斯集市》(Владимир Войно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умный человек// Русский базар) [J], 莫斯科: 2004-03-02.

[8] 索尔仁尼琴:《坍塌的俄罗斯》(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Россия в обвале) [M]. 莫斯科: 思想出版社, 1999.

[9] 扎拉耶夫:《日落:索尔仁尼琴论俄国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Зараев М.Сумерки бог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о месте Росс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见：
http://www.evreyskaya.de/archive/artikel_238.html。最后登录时间 2010 年 11 月 6 日, 发布时间不详。

[10] 《莫斯科新闻》(The Moscow Times) [J], 莫斯科: 2008-08-07.

(责任编辑: 山宁)